

18年药企为何1元钱甩卖

技术创新，决不是靠热情就能解决的，而必须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展开。否则，就算有所创新，也无法达到创新的目的。

谭浩俊

12月8日，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受让金健米业全资子公司湖南金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交易价格为1元。公告显示，交易的目的是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聚焦粮油主业的发展，提升公司资产的整体运营效率。

对金健米业来说，把药企卖掉，聚焦粮油主业，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挖掘和分析的东西。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很多企业都加快了业务转型步伐，都把重点转

向了做强做优主业，以减少非主业对企业资源的占用，也减轻企业负担。

但是，金健米业对金健药业的转让，还是多少有点可以挖掘和分析的东西。尤其是一家成立了整整18年的企业，以1元钱的价格转让，多少还是让人有点看不透。毕竟，药企不同于一般企业，生存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中药企业，生存的空间更大。

那么，金健米业为什么要将药业卖掉呢？卖掉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亏损是不是金健米业卖药业的唯一原因呢？不难看出，亏损确实是金健米业卖

药业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2013~2017年，金健药业亏损额分别达到3059.68万元、5418.89万元、1.68亿元、1736.68万元和1030.58万元，处于连年亏损状态。特别是拥有的全国独家剂型品种“茶普生钠注射液”，因产品单一，同时受市场波动和行业政策影响，近年来处于持续亏损状态。如果“独门武器”都处于亏损状态，那金健药业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为什么连“独门武器”也能亏损呢？这就不能不说说中药应当如何创新了。作为沿袭了几千年的中药，长期以来都是以药剂、片剂、汤剂以及外敷等为主要使用手段，更直接地说，就是外敷与口服。金健药业以创新的方式将中药制成针剂，通过注射的方式用于治疗疾病，确实有独到之处，应当算“独门武器”。关键在于，决不是将其制成针剂就能产生疗效，就能达到创新目的。其制成针剂以后疗效怎样、与片剂等相比是否疗效更好、有没有副作用、副作用有多大、有哪些方面的副作用，也应当同步分析。切不要用不懂医学的人的话来对待中药针剂，中药不是无毒，而是毒性较小、毒性形成有一个过程。如果真的产生了毒性，可能比西药更加可怕。

恰恰是这方面的问题金健药业没有考虑好，或者没有考虑周全，没有解决的办法，没有预防的措施。所以，针剂投入使用后，副作用就成了金健药业“独门武器”最大的问题。《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17年)》显示，2017年中药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注射剂和口服制剂所占比例分别是54.6%和37.6%；从严重报告涉及的给药途径看，静脉注射给药占比较高，为61%。今年6~7月份两个月时间里，从柴胡注射液、双黄连注射

剂、丹参注射液、天麻素注射液、清开灵注射液，再到此次血塞通注射液和血栓通注射液，国家药监局6次发布公告要求修订中药注射液使用说明书。

也就是说，别说针剂，连口服都存在较大问题，注射就更不用说了。而注射通过血液进入人体，一旦发现问题，更难处理。那么，医院还怎么给患者使用中药注射液。没有医疗机构使用，生产中中药注射液的企业，也就没有日子可过了。

所以，对金健药业来说，主要问题不是亏损问题，而是药品、特别是“独门武器”中药注射液的疗效和安全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金健药业生产的药品就不可能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效益，最终只能亏损。

那么，1元钱将股权转让给湖南粮食集团，到底是想通过粮食集团解决金健药业产品存在的缺陷呢，还是剥离亏损资产。如果是前者，粮食集团有没有这个能力，是一个问题。毕竟，中药方面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不是一般人能够解决的。如果一般人能够解决，金健药业早就解决了，不会等到连续多年亏损。因此，金健药业的股权转让，更有可能是剥离亏损资产，让金健米业能够业绩改善。不然，金健米业会被药业拖累。

联想到这些年来，很多与农业、农林等相关的企业，都在药业方面有所动作，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人才引进、支持研发、产品开发，但是，成功者寥寥无几。特别是中药的研制与开发，更是难度极大。这也预示着，技术创新，决不是靠热情就能解决的，而必须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展开。否则，就算有所创新，也无法达到创新的目的，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创新，需要的还是务实、求真，来不得半点虚伪和草率，更不能太过功利。

2019:美国经济变数丛生

张锐

即将于今年年底退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日前接受《华尔街日报》和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将开始感受到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带来的“寒意”，甚至奥布斯特费尔强调，2020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程度可能比2019年还要严重。

奥布斯特费尔德的预判并非危言耸听。上周，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超过3年期和5年期国债收益率，2年期国债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收缩至不足10个基点，短期国债收益率与长期国债收益率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首次出现“倒挂”。历史数据显示，收益率的倒挂往往领先于经济衰退，其中自1950年以来，美国总共出现10次国债收益率倒挂，最终有9次出现经济衰退。

与债市异象联动，美股最近一段时间也隔三差五地上演大幅跳水行情，标普500指数已从52周最高点下跌了至少20%，苹果、亚马逊和谷歌等在内的5只科技股平均跌幅超过了20%，有的甚至超30%，总市值蒸发了近万亿美元。这种情况历来被看成是美股转入下跌通道的重要维度，因此，大摩等权威分析机构预计2019年美股至少会下降20%。

美股若在明年真的由牛转熊，其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就不会只是像债市“倒挂”那样仅仅具有预警意义，而是会真真切切地掣肘经济前行的脚步。金融危机以来，美股持续上涨已达10年之久，美国家庭净资产突破了100万亿美元，全美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至14.55万亿美元，两者之比高达6.87，创下历史新高。股市的财富效应也非常强劲地传递到了消费，今年以来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始终维持在98以上的高位，并创出了18年以来的最高，消费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动能不断加强。显然，股市一旦出现转向，持续旺盛的美国家庭消费支出势必会出现财务性递减，再加上连续升息产生的滞后效应（主要表现为消费成本的增加），二者的叠加最终必然抑制消费作用于经济的能量。

当然，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储蓄既可以转化为投资(S-I)，也可以转化为消费(S-C)，因此，在美股增量财富对消费经济不足的情况下，理应还有储蓄形成新的功能替代。但一项新的研究发现，目前大多数美国工薪阶层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缓冲，58%美国人的存款不足1000美元。显然，储蓄转化为消费从而形成经济增长接续动能的经济假设在美国没有多大的意义，未来一年消费伴随着股市走软存在着较大的概率。

其实，消费的疲弱已经出现先期信号，而且不乐观的迹象发生在房地产这一关联美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领域。统计数据表明，伴随着美元利率的上升，美国国内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目前已经升至5.2%，创下八年来的新高，虽然今年国内工资收入增长了3.1%，但房价却上升了5.5%。由于房价高企和借贷成本高企，今年以来民众房屋购买抵押贷款申请数量下降了近14%，同时房地产企业的再融资申请数量下降幅度超过了40%以上。两项指标显示着房屋需求与供给端动能均有所减弱，集中表现为，美国国内新房购买人数已经出现连续一年半的减少，同时住宅建筑商信心指数也跌回到了两年前的低点。因此，专利申请数量的全球第一地位虽充分体现了我国不断增长的国力，但背后问题依然不容忽视。下一步，我国还应继续加大人才的培养力度，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其次，多从政府引导入手，激发社会创新活力，渐渐形成社会创新投入对政府创新投入的替代；再次，在简化专利申请审核手续的同时还应加强专利的审查力度，充分细分专利的种类，选取更能反映国家创新能力的指标，在创新路上戒骄戒躁，稳步前行。

年截至目前全美单户住宅和共管公寓的库存同比分别飙升86%和188%，成为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期以来最大规模的同比增长，同时，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3%的美国人计划明年买一套房子。历史经验昭示，房地产建筑与销售状况往往是美国经济是否景气的行业风向标，而临近2018年末房地产状况建设现如此不尽人意，意味着住房建设经济增速放缓的程度可能比2019年脚步的重要拖累。

回过头去看，促成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除了升息引起的资本“虹吸效应”外，更直接的加速器就是特朗普超大力度的减税安排，但减税对经济刺激效果的边际递减效应必然在2019年显示出来。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测算，本轮减税对美国GDP名义规模的提升幅度在2018~2020年分别为0.8、0.7、0.5个百分点，而由于今年的减税刺激对于明年来说又拉高了基数，因此反映到预测的增速上，就有可能大幅提升今年增速而压低明年的增速。另一方面，与1981年、1986年以及2001年的减税均发生在之前美国经济出现下行和企业利润明显减速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本轮美国的减税其实是发生在经济复苏以及企业利润回升的环境中，这就意味着相比以往几次减税，本次减税政策的传导滞后周期将会更快，减税的刺激效果会在今年更快、更多地体现出来，相应地，2019年的边际递减效应也就更强烈与更清晰，经济肌体从政策创新中获取的增量动能也就更弱。

关注减税的边际递减效应的同时，更不可忽视因为减税而引起的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放大以及债务率的提高。理论上说，税收就是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财富分配或者再分配手段，二者之间必然存在“跷跷板”关系。数据显示，为了抵消因为减税而带来的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今年美国政府的发债总额达到1.338万亿美元，举债规模创下2010年以来最高年度发债量。但借钱速度永远比不上花钱速度。据美预算办公室(CBO)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财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较去年同期扩大17%，至7790亿美元，创下六年来的新高；同时CBO预计，2019年财政赤字将达到9730亿美元，并在2020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由于美国中央政府债务占比已经接近100%，在美元持续加息后，10年期美国国债的利率超过了3%，意味着美国每年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3%以上。

动态地观察，美国政府短期违约的可能性不高，但因为债务率与赤字率的提高在短期内对美元构成的反压不可避免。目前包括高盛、花旗在内的所有顶级投行都一致看空美元，预计未来12个月内美元兑G10货币将下跌2%左右。而美元的下跌意味着美国国内资本可能出现逆向流动，同时抬高企业原材料采购成本以及居民消费成本，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由此大大增加。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计，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为2.5%，比前一个阶段的预测值下降了0.2个百分点。当然，美国政府手中应当不缺少可以阻止经济出现意外下滑的政策工具，一是美联储放缓加息步伐甚至停止升息，同时减少“缩表”的力度，给市场充分的喘息期；二是特朗普既定的总规模为1.7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计划加速落地与实施，对经济构成新的拉力；三是中美两国贸易谈判相向而行，摩擦对抗转为合作共赢，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得到及时屏蔽；四是美国与欧盟、日本的贸易计划全面启动，经济增长获得新的外部赋能。而对于全球经济来说，作为“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如果能够保持平稳态势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邮箱至pp118@126.com。

药房托管 别让药事服务“悬空”

罗志华

日前国家卫健委下发的《关于加快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坚持公立医院药房的公益性，公立医院不得承包、出租药房，不得向营利性企业托管药房。记者发现，尽管此前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已纷纷表态将严禁甚至禁止药企托管药房，但也有的表示要“审慎设定与医药企业的合作模式，不应与有关企业开展药房‘托管’或类似业务合作”，态度较为温和婉转，而此次属于第一次在国家层面对公立医院药房托管现象直接说不。

近年来，公立医院将药房承包、出租、托管出去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些医院还将之当成一种创新，希望能够走出一条可供借鉴的新路来。应该承认，这样做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医药分开的彻底做法，就是医院主要承担医疗工作，将药品的保障任务分离出去，如此可以确保医疗行为不受药品利润的太多干扰，医生专心于诊疗。此外，医院并非将所有药品都交给社会供应，基础用药、特殊用药、住院患者用药等，往往仍然掌握在医院手中。

同时，医院这样做也有其苦衷。当前，取消药品加成之后，除了中成药等少数药品之外，医院再也无法从药品当中获得利润。不仅如此，医院还得承担药品的人力、仓储、损耗等成本，有时候，医院的药品流量越大，倒贴进去的钱也越多。将药品供应转给社会上的药店，医院可以减轻负担，药店可以增加利润，实现两

者的双赢。

然而，医院和药店一拍即合，利益受损的却是患者。向患者提供药品，并非将药品交到患者手中这么简单，还需要进行药事服务，包括合理用药评估、用药情况的跟踪、毒副反应收集与应对等。医院将药品的供应权转交出去，往往伴随着这些服务也被取消。也就是说，药房托管若操作不当，药事服务就会“悬空”，失去了责任主体。

更应该看到，医院还需进行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药房转包和托管出去后，这些项目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再加上以盈利为目的的药店，很可能对医院的处方来者不拒，直接发药了事，处方的合理性就更难保障。

假如只把药品交出去，药事服务等方面没有做好衔接，患者所获得的服务就会大打折扣，医院实质上是将药品带来的亏损以及围绕药品的诸多服务，都一古脑儿地抛了出去，变成了事实上的“摆挑子”，这对维护用药安全和药品供应秩序都十分不利。

近两年来，药品领域推出了不少重大改革举措，比如存在了几十年的药品加成政策被取消、药品流通实现“两票制”等，药品供应模式彻底改变，服务模式也应随之调整，假如医院对药品的管理与服务仍然沿袭过去的一贯做法，必然无法适应新的形式。

假如放手医院自己解决问题，难免会出现损害用药安全和患者利益的做法。只有重新赋予药师队伍新的职责，转变药学服务模式，并在叫停不合理做法的同时，适当补偿药品给医院带来的成本，方能在医院构建适应新形式的药品供应和服务体系。

培训机构贩卖学生信息成灰色产业链



朱慧卿/漫画

孙勇/诗

信息倒卖太猖狂，盯上学生和家。羊头狗肉出新例，培训机构皮两张。层层倒卖留隐患，诈骗分子撒大网。取缔灰色产业链，惩前毖后依法纲。

让中国专利成为货真价实的创新指标

盘和林

日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的全球专利申请数量达317万件，创历史新高。从受理专利申请的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的申请数达到138万件，占全球整体的四成多，连续7年位居首位。

从197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科技创新领域“三步走战略”，中国科技创新走过了改革发展的40年。

40年来，无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是国有民营企业，始终共同努力，不断开拓创新，助力中国制造业向中国创造的改变。凭借庞大的人口优势，我国在短时间里完成了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每年毕业的本科生近400万、研究生50万、博士生5万，渐渐积累起来的人才储备为我国科技持续的进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凭借着人才优势，我国科技人员数量不断上升，据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

中心《国家创新蓝皮书》指出，2011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已占到世界总量的25.3%，超过美国研发人员总量及占世界总量的比例(17%)，居世界第一。并且，中国研发人员同期年均增长率为13.5%，稳居全球首位。

除了人才储备和供给，国家始终还在加大科技投入。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4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之比)为2.10%，比2012年提高0.17个百分点，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企业层面来看，2014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和高技术企业减免税分别为379.8亿元和613.1亿元，分别比2012年增长27.2%和16.2%，年均分别增长12.8%和7.8%。

日媒在报道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全球第一的同时提到，中国对保护知识产权显示积极态度。确实，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竞争日渐增强，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央政

府积极应对，不断调整发展战略适应国际局势的变化。从最初的解放思想、鼓励创新，到后来的实行市场经济鼓励竞争，再到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发展要求，每一步的部署都紧随时代的发展。

特别是，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给予了社会创新最大支持，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企业创新环境日趋良好。就在前些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该备忘录由发改委在内的38个部委联合印发，明确严重失信行为及联合惩戒措施，旨在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可以说，近几年来，无论是人才投入还是资金投入，无论是创新体制改革还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我国在科技创新上的努力不可谓不大。也正是由于政府、社会、企业的共同努力，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得以如此快速增长。

不过，专利申请数量虽然可以反映一国的创新水平，但却不能代表整体的

创新质量，由于国家鼓励开拓创新，很多企业以求求补贴为导向，申请专利呈井喷的态势。而与之相对的是，我国知识产权审查局工作人员仅有千人，简约的申办审核手续降低了行政成本，加速了专利办理，但同时也带来专利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网上一度流传有“数字陷阱”的说法，即专利数量虽不断增长，但真正反映社会创新水平的并不多，由此可能引发的专利申请大跃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因此，专利申请数量的全球第一地位虽充分体现了我国不断增长的国力，但背后问题依然不容忽视。下一步，我国还应继续加大人才的培养力度，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其次，多从政府引导入手，激发社会创新活力，渐渐形成社会创新投入对政府创新投入的替代；再次，在简化专利申请审核手续的同时还应加强专利的审查力度，充分细分专利的种类，选取更能反映国家创新能力的指标，在创新路上戒骄戒躁，稳步前行。